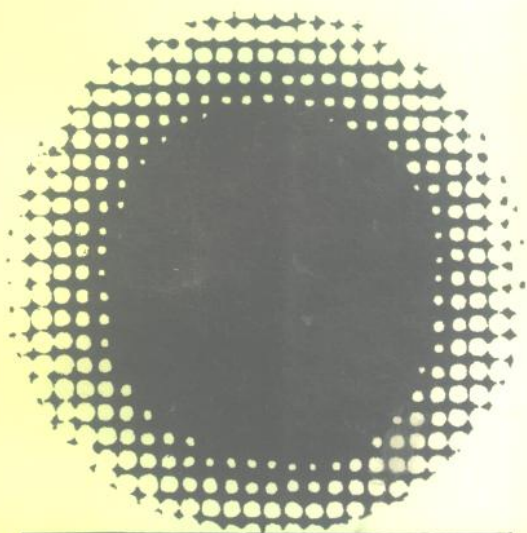


文化与进化

[美] 托马斯·哈定等著

韩建军 商戈令译



比较文化丛书
Comparative Cultures Series

2.4

3



比较文化丛书

文化与进化

〔美〕L.A.怀特序 托马斯·哈定 大卫·卡普兰
马歇尔·D·萨赫林斯 艾尔门·R·塞维斯合著
韩建军 商戈令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0003061

Copyright ©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0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o. 60-7930

· 比较文化丛书 ·

文 化 与 进 化

〔美〕L·A·怀特 序

托马斯·哈定

大卫·卡普兰

马歇尔·D·萨赫林斯

艾尔门·R·塞维斯 合著

韩建军 商戈令 译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电厂）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3.75 插页2 字数72 000

1987年9月第 1 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33 000

统一书号：3103·273

定 价：1.20 元

主 编 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名誉主席周谷城 主席王元化

主任编务 黄万盛

编 务 黄万盛 商戈令 张士楚 蒋弋为
赵鑫珊 纪树立 周 耘 张 燕
申屠奇 潘 涇

编者献辞——

经过两年的努力,《比较文化丛书》问世了。

100多年前,鸦片战争使我们伟大而又古老的民族从闭关锁国、封建主义的迷梦中惊醒。从此,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开始坚韧顽强地探索着民族自强之路,屡跌屡起,前仆后继。繁荣的经济、先进的科学、民主的社会成为整个民族的强烈愿望。

100多年过去了。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造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业绩;另一方面,祖国仍然贫穷,人民尚不富裕。同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科学上的差距、和那恶梦般的十年动乱,总是令我们民族的自强之心隐隐作痛。

反省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我们的民族成长了。我们颂扬成就,但不妄自尊大;我们正视差距,但决不悲观

失望。现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族心声，已化为中国大地上宏大生动的社会现实。

改革和开放，逻辑地发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文化比较研究的课题由此产生，它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不菲薄历史。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文化、伟大的传统，怎样弘扬这份遗产，使其走向新生？我们也不盲从西方，如何借鉴、消化西方的成就，取彼长，补己短？这正是文化比较研究的题中之旨。

多年来，学术研究历尽坎坷，比较研究自然也成了姗姗来迟的“新学科”。直至今日，比较研究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仍在研究之中；甚至，关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使用，也是五花八门、约定俗成。因此，对译著和专著的采录，也就不拘一格地包含尽大的时间跨度和足够的内容范围。我们期望，通过这套丛书，能把已有和将有的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大家。

《比较文化丛书》编委会

1986年12月

序

莱斯利·A·怀特

伯索德·劳弗 (Berthold Laufer) 在赞扬洛伊 (Lowie) 《文化与文化人类学》一书的评论中说：“在我看来，文化进化论是所有科学理论中最空洞乏味、有害无益的理论……”。他的论述相当典型地表现了曾统治美国人类学界达数十年之久的博厄斯 (Boas) 学派的观点。二十三年后，梅尔维尔·J·赫斯科维茨 (Melville J. Herskovits) 还站在反进化论的立场上“热衷于表白他的信仰” (1941年)。我还听说，博厄斯学派反进化论的哲学观点，也依然在美国许多大学人类学专业课程中传授。

进化论在美国遭到反对的现象是很难解释的。许多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科学家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被尊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克罗伯 (Kroeber) 语，1943年〕、身为全美科学学会会员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主席的弗朗茨·博厄斯，竟会数十年如一日全力贯注于这一保守和反科学的理论构造。不过，在此我们并不试图对这种现象加以细究。

显然，十九世纪晚期达尔文主义的胜利并没有消灭进化论的敌对者，他们仅仅是暂时被击败了，而且不久又重新构成了

反击的阵势。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进化论在文化人类学中活跃之时，正是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发展的时代：进化和进步恰是当初的时代样式。而在十九世纪末叶，随着殖民扩张时代的结束、和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成熟和确立，进化这一概念就不再时兴了。相反，“保持现状”倒成了风行一时的观念。虽然美国自身是在武装反抗其主宰国的斗争中诞生的，但在二十世纪中叶她却不能允许其他国家走同样的道路。世界许多地区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亦总是被她称为“侵略”，并受到经济上、军事上乃至道义上的攻击。

关于博厄斯，我们当然不会把美国人类学中反进化论运动的起因归咎于他。他只不过是在这一社会思潮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罢了。事实上人们不难发现，那些在美国本土生活以及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里的反进化论者，与德国出生的博厄斯以及博厄斯学派中大部分著名的欧洲成员相比，是大不相同的。比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就曾这样说：“进化论的历史观在否认个人独创性的无比重要性时就显示出，它是一种非科学的极端模糊的观念，也是一种现代科学决定论向最古老的东方宿命论的倒退”（1880年：455）。他还宣称：

“进化论的哲学……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教条，仅此而已。与其说它是一个思想体系，更应说它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感情态度。这是一种和世界一样古老的思想方法，对它所体现的任何哲学（比如斯宾塞的哲学体系）的驳斥都不会使它消除一种宿命主义的泛神论……”（同上：458）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田纳西州美国南部山区居民的司各帕斯审理案则向我们提供了博厄斯学派以外当地美国人反进化论的另一实例。

但是，反进化论完成了其自然的循环历程，进化论又一次席卷而来。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正再次经历迅猛而深刻变化的世界上。非洲和亚洲一些所谓的落后国家兴起了反抗白种人和殖民主义的浪潮。整个世界的社会组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或面临着现实变化的可能性。而一个承担着“领导世界”之任的国家则已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

假如科学要发展，科学要包括文化人类学，那么进化论的东山再起无疑是势所必然了。进化论的概念已经以其重要性和富有成效证明它由不得任何自称为科学的东西而含糊其辞地被置之不理了。因而，进化论迟早总会在文化人类学中复苏。本书所论则展示了进化论已经达到了何等程度上的复苏。

除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倾向和政治生活倾向、以及思想观念上相互作用的影响外，达尔文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也促进了文化人类学中进化论的复苏。为纪念《物种起源》一百周年举行了那么多的庆祝活动，还有那么多的著名学者参加，这些都不能不对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产生巨大影响。梅克伦南 (McLennan)、梅因 (Maine) 和摩尔根 (Morgan) 一代的学者，都是将原则置于公众接受和同行毁誉之上的。与他们相对照，如今许多人类学家则对别人的看法和评论特别敏感。他们总想得到同事的尊重和喜爱。可以有把握地预言，文化人类学中的进化论将来一定会倍受尊重甚至广泛流传。也许不久就会有一些人类学家前来向我们说，他实际上自始至终就是一个进化论者。但是，许多自封的进化论者最后将被证明他们实际上是文化历史学家。他们注意的是两个或更多地区间的文化相似性（一致性），或是在不同地区的当地人与白种商人的关系中的起因和结果上的相似性（斯图尔德 Steward, 1955, 1956）。正如以前进化一

直被误认为历史，历史亦会被错误地当作进化一样，这一事实可能会阻抑新出现的进化论倾向。然而从长远看，我们却无需为此担忧。进化论的基本精神和强有力的科学方法终将取得最后胜利。

从本书论文看，萨赫林斯(Sahlins)对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作的区别应该大大有助于澄清历史与进化两者概念上长期存在的混乱。由于一个特殊文化的进化是按年月顺序具体叙述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克罗伯把一般进化定义为“概述的历史”或“仅仅笼统的历史”。但特殊进化不是历史，历史是对仅仅与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事件的叙述。特殊进化是按年月顺序发展的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形态：一种形态导致另一种形态。尽管特殊进化发生在单一的种系范围内，但它仍然是时间的普遍化过程，而历史则包括许多时间的特殊化过程。

一般进化较之特殊进化与历史则相去更远。历史不是任何时间过程的名称或对任何时间过程的叙述。进化虽然也是个时间过程，但属于另一类型。萨赫林斯对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所作的区别应该有助于表明，正是特殊进化常被错误地称为历史；并且，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同样是进化。萨赫林斯对一般进化的论述还应该有助于表明，对世界文化进化或技术进步的叙述与历史地叙述三十年战争或对任何“笼统的历史”的叙述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萨赫林斯对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所作的区别，还有助于结束有关线性发展进化（或称普遍进化）与多元发展进化的毫无意义的论争。据我们所知，从来没有人坚持说文化上唯有一种线性发展的进化形式。但我们知道有人主张唯有多元发展的进化论才是有根据的或有意义的。正如萨赫林斯十分清楚地阐

明，进化在具体范畴里（种系系统里）是多元发展的，而在一般范畴里是线性发展的。从来没有人比萨赫林斯更清楚地区分过线性发展和多元发展这两种各不相同但又不可分割互为补充的进化范畴。萨赫林斯还非常清楚地说明，一般进化的理论远非“明显无用”的，相反，它却为进化的整体与部分同时投下了一柱强光，使我们得以对其更好地获得洞悉和理解。

在此，我不打算也不可能对本书各篇逐一概述，因为各篇论文都将详尽地证明自己的观点，且每位读者亦将从中见仁见智，故只作些必要的评述。哈定(Harding)的论文富于启示并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具体的进化过程是如何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创造性，而在另一些方面却表现出保守性：即当适应过程进行之时，新事物便产生并发展出来；而一旦适应过程完成，重点便会转向保持现状。在“文化优势法则”一文中，卡普兰(Kaplan)对特殊优势和一般优势作了区别。就特殊优势论，一种文化或文化类型将通过加强其适应性确立自己在一个特殊环境里的地位，它是作为能最有效地利用那一环境的类型而生成的；从一般优势看，一种文化的发展则必须具有对更大范围里各类环境的更强的适应能力，并对这些环境中的资源具有更高的利用水平。他还运用热力学的术语来解释文化优势法则。

塞维斯(Service)在其才华横溢的“进化潜势法则”一文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法则如何使许多长期来一直含糊不清或被误解的人类学问题变得明白易懂。他用这一法则来说明“美国的现在和未来”，富于独创性和启示性，确实令人振奋。我若是在此对论文作全部的或部分的摘要或解释，那么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读者，都将是欠尊重和不公允的。

上述论文有以下共同特点或特征：他们都是非心理学的文

化学者，他们力求严格坚持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避免自由臆断和其他形而上学的解释方法。他们不但从进化的角度，而且还从其他方面对生物体系和文化体系之间的基本共性进行了阐述。他们把文化看作一种热力学系统，认为其主要功能是对游离能量的摄取和使用。

在如今所见有关文化进化问题的最新论述中，这些论文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它们的优秀之处将分别由他们自己提出的论点给以证明。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年轻的人类学者。数十年以前，反进化论的对手不得不与诸如“传播论对进化论的否定”、“进化论是自生物学借来而套用于文化现象的理论”、

“澳大利亚人的技术是原始的，但却有先进的社会制度”等一系列用以驳斥进化论的论点展开论争。他们不得不去适应博厄斯学派反进化论者提出的论点，针对具体的批评和攻击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因而使自己的理论范围和观察视角受到很大限制。但这些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家则没有受到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他们不是在反进化论的氛围中培养出来的。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文化进化论，因而相对来说很少受到上述论战的影响。他们一直在自由地探索进化论应用于文化领域的意义，以至富有成效地发展了进化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当然也必须声明，无论是权威还是现代作者，都不会承认这些论文是尽善尽美的或终极的真理。它们只是对于说明某些情态是富有探索精神和启迪作用的，也可以说，它们是自圆其说且令人信服的。应该看到，为文化进化论充满生机地进一步发展而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和新的建议，正是现时代最需要的。很有可能，本书的某些假设会发生问题，有些则将引起争论，也许还会从中败落。但这些都无关宏旨，这些批评将

不仅导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还能改变博厄斯那种一味拒绝反驳的情境。我们相信，这些论文的观念只要被人重视或接受，就将导致这种进步。他们定能鼓舞和激发更深的研究并沿着进化论的路线进一步前进，就此，文化人类学也将改变与其他科学相分离的局面，或不再被排斥在所有科学基础范畴和有效概念之外。

目 录

序(莱斯利·A·怀特)

一、导论	1
二、进化：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	10
三、适应与稳定性	37
四、文化优势法则	55
五、进化潜势法则	75
后记	91
文献目录	93
译者后记	103

一、导 论

本书篇幅之小看起来似乎与它宽泛的标题很不相称，因此有必要声明在先：本书目的不是叙述实际的文化进化，而是对一些我们认为属于文化进化理论基础的一般原则进行论述。

如今这类尝试比之二十年前甚或十年前更能为人们所乐意接受了。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进化论在英美的文化人类学中几乎已销声匿迹。斯宾塞，摩尔根和泰勒的著作曾在十九世纪末叶带来文化进化论的兴盛。但这种理论随后遭到了弗朗兹·博厄斯和他早年学生们长达数十年的激烈抨击。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似乎认为博厄斯已经摧毁了进化论——一位评论家说——进化论“实际上被推翻了”。自那以后，人类学家不再持积极反进化论的态度而成为消极冷漠的非进化论者。由怀特和查尔德 (Childe) 发起的支持进化论观点的论争在一代平静下来的人类学家中几乎没有引起注意。

我们在此无法进行复杂的长篇论述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文化进化的忽视。博厄斯是卷入反对进化论的人类学家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一个，但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也在发生着类似的倒退现象，这一事实则说明还有广泛的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用。博厄斯当然不能因此免遭批评，因为引证一个科学学科理论思潮代表人物的个人作用毕竟是评价这一思潮的合理方法。然而，这却不足以解释事物发生的原因。

今天，文化进化论似乎正在复苏。这是不是我们正在目睹的世界性的矛盾冲突——因循守旧的社会制度和曾经落后受统治但已经觉醒而且重又把“进步”作为时代口号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呢？进化论在西欧的最初兴起是与当时的工业革命和对封建主义的胜利密切相关的；目前进化论的复兴可能也是与当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新工业社会的出现和对这种社会的寻求紧密相联的。不管怎么说，至少人们对文化进化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

几年来，英美的人类学界对博厄斯经验主义的思想之贫乏及历史感严重匮乏一直感到不满。年轻一代的文化人类学者似乎越来越渴望从其他方面寻求理论的借鉴——从社会功能学、精神病学和形而上学，从维布伦（Veblen）、韦伯（Weber）、马克思（Marx）、弗洛伊德（Freud）、汤因比（Toynbee）等等——有这么一个博采兼收的气氛，进化论或许能找到立足之地。

然而与此同时，正如克罗伯所指出的，人类学（与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一起）所进入的这一精神探索和借鉴的时代是以流行思潮的昙花一现为特征的。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甚至害怕进化论也将成为某种流行一时的思潮。1959年纪念《物种起源》问世一百周年之时，一下子出版了许多关于文化进化的专题论文和著作。这当然是可喜的现象，但一个令人震惊的巨大变化却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些过去从未对进化表示过兴趣（除了反对之外）的著名人类学家现在则至少在他们的词汇中增加了“进化”一词。某些主要的人类学家现在还似乎显示出

他们一直在应用进化理论，如同他们一直在应用散文体一样。那么，我们不妨尽可能强有力地对这种赶潮流的逻辑进行辩驳：我们绝不认为进化的理论，当然更不认为仅仅“进化”这个词就是解决所有人类学问题的万应良药；我们绝不认为一个人甚或任何人为了不当“守旧者”便应该立刻放弃他正在做的事。进化论的观点曾在人类学中丢失，我们切望投入当前恢复进化论的努力中去，但绝不以牺牲其他许多合理的人类学成果为代价。

也许有人会将本书看作“新进化论”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已在前面作了否定。而且，尽管本书作于纪念达尔文一百周年之际，但它既不是受查尔斯·达尔文的启示，也不是为他而作。我们无意低估这位伟人在生物学上意义深远的贡献，但我们不应忘记，早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有了对社会和文化的进化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在十九世纪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们建立的理论基础上着手我们的研究的。我们所持完全是旧进化论的观点，而不是什么新进化论观点。E·B·泰勒关于进化是“每一个试图对他生活其中的世界或过去的历史加以理解的学者所必须牢牢掌握的伟大原理”的观点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更具体地说，我们赞同泰勒对进化过程以及对其研究所持的两重分析法：一方面是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由“阶段到阶段”的一般发展；另一方面是各种类型的文化的特殊进化。对这种进化的两重性进行解释，并对由于分不清进化的两重性而产生的诸多混乱进行讨论和澄清构成了本书下一章节“进化：特殊和一般”。第三章“适应与稳定”考察了各种类型的文化在具体进化中的结构及其进化的结果。第四章“文化优势法则”着重论述了一般文化进化和特殊样态的文化进化都具有的重要结